

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的历史脉络

核心阅读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改革开放事业以来，对党的建设长期思考和实践的理论成果。弄清楚它的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成熟过程，进一步加深党的建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地位作用的认识。

□ 祝彦

（一）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969年至1975年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公正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在梁家河插队一两年后就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尤其是他参加赵家河大队的社教运动，以及入党并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期间，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特殊的实践。体现在，对党坚定理想信念；不光喊政治口号，而是踏踏实实为群众办实事；把搞好生产与党建工作结合起来；耐心细致做思想工作；对违反纪律绝不姑息；率先垂范体现党员干部的先进性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书中找出活生生的例子。特别是在把思想建设与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结合起来这方面，当年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给全党同志树立了榜样。1974年经过全村党员选举，上级党委同意，习近平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以及给村里打了一口井、办了一个铁业社、办了一个缝纫社、办了一家代销店、打淤地坝、办了一个磨面

坊。一件件的大事实好事的办成，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思想工作自然顺顺当当。

习近平总书记知青岁月里的务实作风，以及“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的道德情操，体现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成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特色。因此，梁家河知青岁月，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萌芽时期。

（二）

1982年初已经在中央军委工作的习近平，主动要求到农村基层去工作，当他把自己的打算向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汇报时，耿飚曾经挽留他说，下基层锻炼是好事，也可以到野战军去嘛。但他还是坚持要到地方上去。习近平跟插队时的好朋友陶海粟说，他之所以要下到农村地区去做基层工作，主要是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国家已经步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在地方上会比在军队里接触的事物更全面，更接近民生民情，对自己的全面锻炼更有利。二是他自己在陕北干了7年，知识和工作经验最丰富的积累，还是从农村来的，而且农村目前正处在改革的前沿，还是到农村去才更能发挥他的优势。他还跟这位亲密朋友说：“这次下去，干得好，将来成就一番大事业，干得不好，就在下面给老百姓做些实事，也没什么。”这位朋友2017年回忆说：“听他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但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

正是因为带着这种沉下去的执着，习近平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的3年多时间，满腔热情地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以改革精神扎实开展各项工作，并把立足于对本地工作的思考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关注结合起来，著述成文，于2015年以《知之深 爱之切》为书名出版。该书收录了习近平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在正定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章、书信等共37篇。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十八大后让内同志感觉很熟悉的名词如“政治纪律”，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讲话中就进行了深刻论述，把抓政治纪律“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结合起来。为了改进全县领导干部作风，1983年，习近平主持起草了中共正定县委《关于改进领导作风的几项规定》即“六项规定”：一、总揽全局，抓大事。二、反对官僚作风，注重工作实效。三、搞好“一班人”团结，维护县委领

导的统一。四、以身作则，不搞不正之风。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六、树立雄心壮志，为四化争先创优。正定时期的“六项规定”为十八大后的中央八项规定的制定，作了历史的经验积累。因此，主持正定工作的几年，可以理解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

（三）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宁德地委书记，在这期间，习近平率先垂范、亲力亲为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提出了许多关于推进党的建设的富有创见的理念、观点和方法，这在199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得以鲜明体现。从中我们发现，主政宁德期间，习近平提出了“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加强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建设好农村党组织”“廉政建设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等论断，号召党员干部“四下基层”，自己带头乘车近3个小时、步行2个多小时，三进寿宁县下党乡访贫问苦，为群众排忧解难。习近平还精辟论述了从严治政，指出：“从严治政、为政清廉关系到改革开放的成败，始终是我们党的生命线。”

“之江新语”是《浙江日报》头版的特色栏目，从2003年至2007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4年时间里用笔名“哲欣”发表了232篇短评，2007年辑录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再版。在这232篇短评中，党建类最多，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很多篇幅阐述了党的建设各方面内容，比如“用思想武器管好自己”主要论述党的思想建设问题，“基层干部的分量”讲的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做人与做官”就是论述党的作风建设问题。“莫把制度当‘稻草人’摆设”论述的是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关口前移，惩防并举”阐述的是反腐倡廉建设问题。“领导干部是作风建设的主体”则提出了“关键少数”的问题。其间习近平还有一本“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的著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其中收录的是习近平在浙江任职期间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和批示，2006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2013年再版。其中蕴含着习近平任职浙江期间丰富的党建思想，涵盖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改进党的作

风、反对腐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方面面。因此，福建和浙江时期，可以理解是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发展时期。

（四）

党的十七大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就党的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从总揽全局的高度对党的建设进行了更加系统全面深刻的论述。如关于党的政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关于党的思想建设，他非常重视理想信念，并形象地阐述道：“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关于党的组织建设，他提出了“治国之要，首在用人”的重要论断，并提出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关于党的作风建设，他发人深省地指出：“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关于党的纪律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他有着深入思考，认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这些重要论述形成了“两个坚持”“5+2的布局”的习近平党建思想，分别体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和第二卷，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著作中。这些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熟，并在党的十九大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党建思想

杨靖宇：东北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 王恩宝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一场极其艰难而又十分复杂的战争。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缔造者、指挥者之一的杨靖宇，领导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运用谙熟的战略战术，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立下了卓著功勋。1935年6月30日，法国巴黎《救国时报》曾刊文赞颂杨靖宇是东北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杨靖宇早在1927年就在家乡河南领导农民暴动。但是领导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与领导河南农民暴动，环境、对象、方式和方方法大不相同。有鉴于此，杨靖宇在1933年1月担任游击队政委初始阶段，便十分注意学习、运用游击战术的原则。

为掌握新的游击战术，提高战略战术水平，培养军事干部，杨靖宇在领导抗日游击战争中，积极引导各级指挥员学习军事知识，认真总结战斗经验和教训。同时，他也十分注重逐步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平和指挥艺术。他随身带有从中央苏区传来的几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在战斗之余阅读、研究。1933年9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建立后，杨靖宇倡导在部队建立战术研究会，经常研究战术问题。每当部队到达新的宿营地，杨靖宇便同战士们讨论、研究假设敌人从某个方向袭来，根据当时的地形如何组织抵抗等问题。战士们认为这种方法很好，因为敌人真来时，

就可以有准备地从容应战。每次战斗结束后，杨靖宇都及时召集各级指挥员讨论作战优缺点、总结经验教训，会后再传达给战士。这种方法非常有利于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能力和水平。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和战士军事素养，杨靖宇还经常安排军事训练，由连长向新战士讲解各种武器使用、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军事常识。

“三大绝招”

杨靖宇在对敌斗争中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游击战术，并娴熟运用，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战士们说：杨司令打击敌人有“三大绝招”。

半路伏击。即摸清敌人动向后，在敌人必经之地选择有利地形，以丛林、塹沟、矮墙等有利地物为掩护，设伏突袭。1933年9月，经侦知，一支有20余辆汽车的日军车队将通过吉林境内通化至山城镇的公路。杨靖宇指挥第一军独立师在山城镇附近公路旁设伏，突袭了陷入包围圈的日军车队，击毙28名日军，缴获1挺机关枪，数支步枪、手枪及一批文件。

远途奔袭。驻在距游击根据地较远的敌人，往往麻痹大意，想不到游击队会从很远的地方来进攻，警戒较为松弛。根据这一特点，杨靖宇经常选择一些合适的进攻目标，率部长途行军，予敌以突然打击，实现作战目的后迅速撤出战斗。1934年春，杨靖宇事先派出便衣队打入吉林临江县红土崖镇，而后率骑兵队经过较远距离疾速行军，通过里应外合，干净利落地消灭了镇内的敌

人。此战40余名敌人未及鸣放一枪便举手投降，其全部枪支和70余发迫击炮弹被缴获。之后，杨靖宇率骑兵队风驰电掣般撤离。待敌人清醒过来寻求援军时，杨靖宇所率部队早已无影无踪。

化装袭击。即采取化敌伪军的办法接近敌人，予以奇袭，缴取敌人的武装。在游击战争中，杨靖宇教育干部战士对缴获的武器、旗帜、服装等军需品要注意保存并予以利用。他经常安排懂日语的朝鲜族战士化装成“日军指导官”，并配备“翻译”，打着日伪军旗帜，带一队身着伪军服装的部队，攻打汉奸、反动地主武装，摧毁敌人据点。1934年4月，独立师骑兵队穿上日伪军服装，打着日伪军旗帜，从河里（今属吉林通化市通化县管辖）沿大路向金川（今属吉林通化市辉南县管辖）进发，途中将相遇的敌公安队一部缴械。敌公安队不明所以，不清楚哪里做得不对得罪了这股日伪军。群众编出歌谣歌颂这种化装战术：“抗联队伍有办法，穿上‘狗皮’把装化。头上戴着战斗帽，腰间还把洋刀挎。粘上两撇仁丹胡，冒充太君来训话。没等训上两句半，翻译官员说了话：赶快缴枪举起手，谁动让谁回老家。敌军官兵傻了眼，一个一个被活抓。”

“四不打”

杨靖宇在指挥游击战争过程中，不仅积累了什么仗该打和怎么打的经验，同时还总结出哪些仗不能打的经验。他曾提出“四不打”，令部队注意掌握。

不能于敌以痛击的仗不打。每次战斗，杨靖宇都强调要精心组织部署，不

仓促上阵。一旦与敌人展开战斗，就要千方百计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于群众利益有危害的仗不打。在战场的选择以及运用何种形式展开战斗方面，杨靖宇首先考虑的是群众利益。当战斗将在村屯、街市进行前，他总是权衡利弊，认为确实对群众无伤害、群众不至遭到敌人报复才最后下定决心。

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每次战斗前，在派出侦察员的同时，杨靖宇还亲自查看作战地点的地形、地貌，仔细观察其远近、险易、广狭，是生地还是死地，即有无回旋余地 and 退路。他总是率部设法占据便于作战的具有山险、密林、河堤、围墙等险要地点，使部队处于有利攻守、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主动地位后，再与敌人开战。

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条件极其艰苦。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抗日武装的武器、衣物、粮食、药品等军需品来源十分困难，绝大部分要靠缴获敌人的战利品进行补充。因此，战斗中能否有战利品可缴，非常重要。杨靖宇在制定作战部署时特别注意这一点。每战必有所得：或是缴获敌人枪支、弹药，或是缴获给养、药品。有的战斗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而有的战斗就是为了缴获军需品。

杨靖宇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优秀指挥员、军事家。对于这一点，就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有才干，是真正具有将才的人物。”他指挥东北抗联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战绩。

党史人物

那有斩不除的荆棘？
那有打不死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猛勇的奋斗着；

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这首题为《胜利》的诗是我党创建初期的重要领导人、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雨花英烈邓中夏所作。

邓中夏，1894年10月出生，湖南宜章人。先后就学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5年参与组织领导省港大罢工，先后担任全国总工会和地方省委领导职务。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39岁。

《胜利》这首诗铿锵有力地彰显了邓中夏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以及对战胜困难的坚强斗志。更重要的是他还真正用奋斗、无畏、光荣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胜利从何而来、如何而来。

胜利是把信仰融进血液的奋斗。从1927年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数以万计中华优秀儿女在雨花台从容就义。当回顾以邓中夏为代表的雨花英烈们的事迹时，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身上三个共同特征：一是牺牲时普遍都很年轻，有的甚至只有十六七岁；二是他们的文化水平都很高，不少同志都学成于国内外知名高等学府；三是这些英烈的家庭条件都很好，生活富裕殷实。然而，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为了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毫无疑问，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就是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正义担当。

1930年，邓中夏从苏联回国，随即被派往湘鄂西与贺龙一起工作。因其从未搞过农民运动和军事斗争，加上盲目路线指导，在指挥上犯过一些错误。1931年末，他被撤职调回上海。其间，邓中夏全靠妻子在纱厂当学徒一个月挣7块钱艰难生活，妻子也因劳累过度导致小产，但他始终对革命事业矢志不移。在邓中夏被捕期间，狱中秘密党支部派人 在放风时问他：“大家想知你的政治态度怎样？”邓中夏说：“问得好！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就是烧成灰，也是共产党人！”

胜利是把人民举过头顶的奋斗。革命胜利是为了人民摆脱苦难，建立新中国是为了让人民平等自由过上好日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是为了让人民享有更好的生活。邓中夏之所以成为工人运动领袖，正是源于他热爱人民、依靠人民。他在日记里曾写到：“在长辛店我看到了许多男女老幼的灾民聚集在车站的周围，露天席地，风寒雪冷，衣没有得穿，饭没有得食，屋没有得住，憔悴枯黄的面色，千孔百结的衣服，引起了我的‘痛苦的同情’。”

在省港大罢工开始之际，邓中夏非常重视对罢工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主持创办《工人之路日报》，举办劳动学院、工人宣传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劳动妇女补习学校，邀请周恩来等领导人作政治报告等，提高工人觉悟，引导他们努力奋斗，为唤醒民众罢工有效打击英帝国主义在香港经济的统治作出了突出贡献。

胜利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奋斗。邓中夏在牺牲就义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封

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区了，你们继续发奋奋斗吧！最后胜利中就是咱们的！”1933年9月21日黎明，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在雨花台下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英勇就义。

邓中夏在狱中曾写道：“中国人很重视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那么苟且偷生的活，也能够叫作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正是有无数个像邓中夏这样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奋斗者，才换来革命胜利之花的绽放。没有先烈们的视死如归，没有英雄们重于泰山的牺牲，革命的胜利都将无从谈起。

胜利是把坚持定为永恒的奋斗。坚持就是胜利。没有强大的战略定力，没有长期的忍耐，胜利终将无法实现。邓中夏尽管遭受了王明等人的不公正待遇和残酷的批判打击，尽管遭受了国民党政府想尽办法地威逼利诱，但他始终在坚定地执行党的各项决定。他说：“一个人遇到挫折是难免的，也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受到挫折就失去了信心。”

1933年1月，在中国互济总会遭到敌人严重破坏后，邓中夏调任该总会团书记兼主任，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进行恢复工作，也致使他在该年5月第四次被捕。邓中夏用毕生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都在坚持做好一件事，就是为党工作。无论自己是否被重用，工作是否有很大危险，他都“持续着，永远的持续着”。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生动诠释了中国人的精神。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更须通过坚定不移、一往无前的奋斗，走出一条现代化强国之路，走出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之路！

史海拾贝